

# 试论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的族属与源流

李 飞 (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)

**摘要:** 本文结合文献和民族志材料,讨论了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的族属,认为其可能和明清文献记载中的“马蹬龙家”、“仲家”、“苗”、“仡佬”的部分支系或其先民有关。贵州地区的“石棺葬”是生态环境和文化交流等多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。在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的两个分布区内,黔中区“石棺葬”是在受当地传统丧葬因素和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的,而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与川滇石棺葬间的关系,目前尚未明了。

**关键词:** 贵州;石棺葬;族属;源流

**中图分类号:** K878.8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6962(2010)02-0048-07

“石棺葬”,或称“石板墓”,在贵州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。早在20世纪40年代,德人鲍克兰在贵州普定进行仡佬族调查时,就注意到了这类被当地人称为“仡佬坟”的墓葬,并在其《贵州仡佬族的历史和现状》一文中,将之称为“石板墓”予以记录<sup>[1]</sup>(P119)。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贵州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清镇、平坝一带发现并清理了一批此类墓葬<sup>[2]</sup>。1972年,清镇干河坝清理了84座小型石墓,随后公布的简报径称之为“石棺葬”<sup>[3]</sup>,由此引发了贵州“石棺葬”的一次讨论热潮,李衍垣<sup>[4]</sup>、席克定等先生先后撰文讨论。此类遗存近年来特别是在“三普”过程中又屡有发现,迄今已逾20个地点。拙作《试论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的分区与年代》一文<sup>[5]</sup>,讨论了贵州“石棺葬”的分区与年代,本文拟就其族属、源流等问题进行探讨。

## 一、分区与年代

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具有以下特点。(1)墓地:墓葬多坐落于缓坡上,都有一片不小的公共墓地,分布较为密集。地表一般有封土,几乎不见叠压打破关系。(2)墓葬结构:筑墓时,先在地表下掘竖穴土坑,再于土坑内用未经加工的石板砌筑墓室,或以石板立砌四壁、石板封顶

(A型),或以石板叠砌四壁、石板封顶(B型),或以石板叠砌起砌墓壁,叠砌顶(C型),墓底或为生土、或铺石子、或铺石板。A、B两型墓最为常见,且在多个墓地共存。(3)葬式与葬具:多一人一穴,仰身直肢一次葬,未见合葬。少数墓葬发现棺钉或棺板等葬具痕迹,知应有木质葬具存在。(3)随葬品:以装饰品和钱币为主,有部分陶、瓷器。装饰品有头饰(铜发簪、发钗、木梳、簪形饰)、耳饰(铜耳铃、玉玦、玉璜)、项饰(串珠、挂饰、项圈)、腕饰(铜条脱、铜手镯)、指饰(戒指、簪形指套)、腿饰(铜条脱),以及带钩、牌饰、铃等。陶、瓷器主要有罐和釜。钱币有汉钱、唐钱、宋钱和明钱,以宋钱最多。

目前已在花溪洞洞坡、花溪林家山、清镇干河坝、平坝坟坝脚、平坝肖家庄、平坝大寨、清镇琊珑坝、普定旧寨、紫云糖梨树、西秀罗陇、西秀大西桥、安顺歪寨、织金三塘、中山马坝、兴义破山、兴义章磨、兴义殷家堡、普安小屯、贞丰浪更然山、黔西化屋等20余个地点发现此类遗存。民族调查资料显示,惠水县城关镇新光村、斗底乡翁歹村、断杉乡、九龙乡等地部分苗族1984年前后尚行石棺葬。行石棺葬的苗族,自称“蒙娄”,是白苗中的一小部分。大方县普

底乡红丰村的苗族,1985年前后仍保留了石棺葬习俗。此外,安顺一带的回族,亦保留有类似葬习。

根据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差异,可将贵州地区的“石棺葬”分为两区,即以贵阳、安顺为中心的黔中区和以兴义为中心的黔西南区。

黔西南区内仅见石板立砌为壁的典型“石棺葬”,墓底或为生土、或铺石板、或铺鹅卵石。石板均系就地取材的河边扁平砾石或山坡上的天然薄石板,无任何人工痕迹。部分墓葬甚至采用天然基岩作墓室一壁。墓室狭长,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,未见葬具痕。浪更然山墓地“石棺葬”与瓮棺葬共存,其中“石棺葬”47座,瓮棺葬18座。瓮棺葬墓室呈方形,以天然石板立砌为壁,底铺石板或碎卵石,中置方格纹陶罐,内盛人骨及随葬品,随葬品有铜镯、五铢、货泉、玉玦等,葬式为拣骨二次葬。二者筑墓所用石材及修筑方式相同,仅墓葬形制存有差异。该区“石棺葬”随葬品以装饰品为主,有玉璜、玉玦、玉环、铜镯、指环、牌饰、带钩、料珠串饰等,另有陶罐、碗等。就其装饰部位而言,有耳饰(玉玦、玉璜等)、项饰(串珠)、腰或胸饰(带钩、牌饰)、腕饰(手镯)、指饰(指环)等,未见头饰和腿饰。该区玉玦、玉璜频见,其中兴义殷家堡3座墓中共出玉玦5件、玉璜2件;破山亦有玉环发现;与浪更然山“石棺葬”共存的瓮棺葬中曾出玉玦1件;这类随葬品不见于黔中区的“石棺葬”中。带钩亦不见于黔中区。而黔中区内流行的铜发钗、条脱、簪形饰、耳铃等则不见诸黔西南区。

黔中区内兼有石板立砌的“典型石棺”以及石板叠砌为壁、石板叠涩为壁、为顶等多种墓葬形制,多个地点两种以上形制的墓葬共存,部分墓葬发现棺钉、棺板等葬具痕。筑墓所用石板,多系从附近山上开采的片状页岩。随葬品以装饰品、钱币和陶器为主,较黔西南区丰富。装饰品有铜发钗、铜簪、骨簪、木梳、簪形饰等头饰,簪形或管形铜耳铃等耳饰,梅瓣、算珠等形状的料珠或骨珠、陶或铜项圈、铜铃、管形铜饰等项饰,铜条脱、手镯等腕饰,簪形饰、戒指等指饰,铜条脱等腿饰。钱币以宋钱为主,有少量唐钱和明钱。陶器有方格纹陶釜、双耳或无耳陶罐

等。此外尚有铁刀、矛、镞等少量兵器。铜条脱、簪形饰、耳铃、发簪、发钗、铃等,是黔中区较具特色的装饰品,黔西南区未见。而黔西南区频见的玉璜、玉玦、带钩等,则不见于黔中区内。

结合随葬品分析,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的年代偏早,约在汉晋时期,墓葬形制单一,人体装饰从简;黔中区年代偏晚,主体在宋明时期,墓葬形制多样,人体装饰繁缛。上世纪80年代惠水、大方等地仍在行用的“石棺葬”,是这类葬习的子遗。

## 二、族属蠡测

在以往的讨论中,李衍垣先生认为“石棺葬”可能与苗族和仡佬族有关;席克定先生认为清镇干河坝属“东苗”,平坝坟坝脚则属“西苗”所遗(两地的墓葬,属席文所划分的“石室墓”,而非“石棺葬”);而大方、惠水等地的部分苗族,安顺、平坝等地的部分回族,至今仍行“石棺葬”,表明“石棺葬”的族属较为复杂,尚难骤定。当时黔西南区的“石棺葬”因发现较少尚未引起关注,他们的讨论因此仅限于黔中区。

由于部分墓葬年代晚至明代,故明清文献可作为讨论族属的参照。明代贵州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,据万历《黔记·卷五十九》称:“贵州本夷地,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,而种类不同。自贵阳而东者苗为伙,而铜苗九股为悍,其次曰狃猪、曰羊獠、曰八番子、曰土人、曰尚人、曰蛮人、曰冉家蛮、曰杨保,皆黔东夷属也;自贵阳而西者罗罗为伙,而黑罗为悍,其次曰宋家、曰蔡家、曰仲家、曰龙家、曰楚人、曰白罗,皆黔西夷属也”<sup>[6]</sup>。可见民族情况比较复杂。今试结合文献中各族群的风俗习惯及墓中所见,一窥其族属。经比对,我们认为贵州“石棺葬”可能与下列族群有关。

### 1、马镫龙家

贵州清代方志材料中数次提到今平坝一带的“马镫龙家”,“死用石棺”。

道光《安平县志·卷五》:“龙家有四种,一曰马镫龙家,在西堡。其性淳良,其衣尚白,丧则易以青衣。男髻向前,以青带额之;女髻以青带绾发,盘其首若马镫状,故名。……死则以石作棺。”<sup>[6]</sup>

咸丰《安顺府志·卷之十五》：“马蹬龙家，衣尚白，丧则以青。男髻尚前，以青带额之；女髻以青带绾发，盘其首若马蹬状。衣短裙长。聘以牛。死用石棺，安平西堡有之。”

冠如马蹬的龙家，在明代文献中已有提及，但未言其葬俗，为漏记的可能性较大，或“石棺葬”于当时较普遍，故未刊载。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·卷一》：贵州宣慰司境内的“曾竹龙家，其俗与龙家同，但妇人以布作冠，形如马蹬，加于髻上，以金木或骨角为长簪焉。”同书又记，安顺州“州民皆龙家”。稍后的《炎徼纪闻》则径称“曾竹龙家”为龙家，清代文献中多称其为马蹬龙家，属龙家之一种。其余龙家的习俗，乾隆《贵州通志·卷之七》记广顺州康佐司的“狗耳龙家”，“男子束发而不冠，妇人辨发螺结，上指若狗耳状，衣斑衣，以五色药珠为饰，贫者则以蕙苡代之。”文献所记的龙家或作为其一支的马蹬龙家，分布在今安顺一带，与黔中区“石棺葬”分布区大体相合。从装束看，龙家妇女髻贯金木骨角等质地的长簪，以五色珠为项饰，与“石棺葬”中的相关发现吻合。而民国《贵州通志·土民志》称，清镇沙子坡的龙家，“男子束发而不冠，善石工”，这为“以石作棺”提供技术支撑。因此，有理由相信，龙家或其部分支系，历史上缺曾行“石棺葬”。

龙家自明代以降，与迁自南京的汉族移民杂居，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特殊共同体。但鉴于诸种原因，一直未对其进行识别。直至上世纪80年代，“南京人——龙家”通过自我认同的方式，选择云南白族作为其认同的对象<sup>[7]</sup>。“死用石棺”的马蹬龙家，今亦已划属白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954年调查时发现部分龙家尚遗有“洗骨”习俗，南京人中未见。其流已清，而龙家的族源尚需深究。

## 2、仲家

前揭文献中屡言及“龙家与侗家同俗”，表明了龙家与仲家间的亲密关系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我们认为不能排除“马蹬龙家”为仲家某一支系的可能性。至少，或因地缘上的接近等诸原因，致使龙家与仲家在习俗上趋同。仲家即今之布依族。龙家中的“马蹬龙家”曾行“石棺葬”，与龙家同俗的仲家因此也有行“石棺葬”的可

能。

明清以降仲家的葬俗，文献里是有记载的。

嘉靖《炎徼纪闻·卷四》：仲家“葬以伞盖墓，期年而火之，祭以枯鱼。……俗尚铜鼓，中空无底，时时击以为娱”。

嘉靖《贵州通志·卷之三》：“中曹司仲家，……死葬，以一伞盖墓，取雨水不侵之意，或三五年掘而化之，葬无定处。”

乾隆《贵州通志·卷之七》：仲家“葬用棺，以伞盖墓上，期年而火之，祭用枯鱼，岁时击铜鼓为欢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的民族调查发现，惠水县摆金等地的布依族非正常死亡者先火化后用陶瓮殓骨灰，正常死亡者以棺殓尸，二者均需阴阳先生根据死者生辰八字等选择下葬的日子，停尸待葬（炕尸）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。下葬时，经济条件较好而采用“大棺材”入殓的，直接埋葬；经济条件不好而采用“散板”入殓的，则需捡骨装入陶瓮中再葬；经火化以陶瓮殓骨灰的非正常死亡者直接埋葬。表现在墓葬遗存上，便出现木棺直接土葬、火化后取骨灰瓮棺葬、炕尸后捡尸骨瓮棺葬三者并存的情况。平塘县上莫乡、三都周覃镇等地的布依族葬俗与之相似，有停尸待葬达数年者<sup>[9]</sup>。

从明嘉靖至清乾隆，仲家葬俗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，出现“葬用棺”。咸丰《兴义府志》强调了这一点，称仲家过去“死则火化，今知用棺瘞矣”。这里的“棺”，当指木棺。那么此前的葬不用棺，用的是什么呢？结合民族志材料看，可能就是瓮棺和石棺。则明时仲家的丧葬过程大略如是：先裸葬（不用木棺，直接将尸体埋入）一年或三五年后，掘出火化后行瓮棺葬。而便于掘取遗骸，第一次下葬时，可能就使用了“石棺葬”。

贵州“石棺葬”流行的黔西南区，一直是布依族及其先民仲家的重要聚居地，据咸丰《兴义府志·卷四十一》载：兴义府辖地内“侗苗居十之八九，猯苗十之一二。”侗苗即仲家，猯苗即罗罗。但该区目前尚未发现可确定的明代前后的瓮棺葬和“石棺葬”遗存，却有汉晋时代的瓮棺葬和“石棺葬”分布，甚至在贞丰浪更然山墓地出现两者共存的现象。虽葬俗相异，但墓葬营建方式和墓内出土物均表明二者密切相关（详前），



前引上世纪80年代的部分布依族葬俗中三种葬习并存的实情亦可为浪更然山的“石棺葬”与瓮棺葬共存的格局提供合理的解释。如果认定黔西南区内普遍存在的瓮棺葬习俗与仲家有关,则该区内与瓮棺葬关系密切的“石棺葬”亦当与仲家或其先民有关。

### 3、苗

苗在贵州分布甚广,几乎所在皆有,并各有支系,十分复杂。明清方志中,据其习俗、地域等差异,将之划分为红苗、黑苗、青苗、高坡苗、短裙苗、歪梳苗、康佐苗等各种支系,各类称呼数以十计<sup>[10]</sup>。

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·卷之十一》:龙里卫“境内东苗……男子科头赤脚,衣用青白花布,领缘以土锦;妇人盘髻,贯以长簪,衣用土锦无襟,……杂缀海贝、铜铃、青白绿珠为饰。”

嘉靖《炎徼纪闻·卷四》:“苗人……未娶者以银环饰耳,号曰马郎,婚则脱之。妇人杂海贝、铜铃、药珠、结纓络为饰。”

乾隆《贵州通志·卷之七》:“花苗,在贵阳、大定、遵义。……男以青布裹头,妇人敛马鬃尾杂发为髻,大如斗,笼以木梳。……葬不用棺,敛手足而瘞之。”

道光《永宁州志·卷十》记今关岭一带的“白苗”,“男子科头赤足,妇人盘髻长簪……丧则屠牛尽哀,近则改用棺殓。”

上引诸文献中的苗人分布在今贵阳、关岭、龙里一带,与黔中“石棺葬”分布区大略相当,种类有东苗、花苗和白苗等,其风俗有两点值得注意:第一,喜于装饰。往往头笼以木梳、或贯以长簪,耳有银环,以海贝、铜铃、青白绿珠为项饰等,这与黔中区“石棺葬”墓主髻贯簪、钗、梳,耳悬耳铃,项有各种珠饰、项圈,腕戴铜镯、条脱,指佩戒指、簪形饰,部分腿上亦有条脱的繁缛装饰十分相类。文献记载中的各类饰品,目前除海贝外,余均见于黔中区的“石棺葬”中<sup>[11]</sup>。第二,葬不用棺。贵阳等地的花苗在乾隆年间尚“葬不用棺,敛手足而瘞之”,关岭一带的“白苗”,至道光时方“近则改用棺殓”。前已叙及,文献中的“棺”当就“木棺”而言,不用木棺,敛手足直接下葬,与绝大多数“石棺葬”对尸体的处理是一致的,而且极可能

就是“以石作棺”。“石棺葬”中也有少数墓葬,四壁未立石板,直接葬入遗骸后以石板盖顶。凡此种种均表明,部分苗族支系曾行“石棺葬”。

民族志材料表明,1980年代,惠水和大方的部分苗族仍行“石棺葬”。其中,惠水城关镇一带行“石棺葬”的苗族自称“蒙娄”,为“白苗”的一支。这是历史上苗族曾行石棺葬的最有力的证明。

### 4、仡佬

仡佬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,曾分布甚广,迄今遗有仡佬寨、仡佬坝、仡佬山、仡佬坟、花仡佬河等大量与之相关的地名<sup>[12]</sup>。后渐融入其他民族中,至民国时仅在金沙、织金、黔西、清镇、平坝、安顺、普定、镇宁、贞丰、关岭、晴隆、六枝、水城、大方等地有仡佬族居住的记载,共约1万余人。1983年,又在黔东北的思南、江口、务川、道真、正安识别出大量仡佬族,其人口总数增至约30万。

在风俗上,部分仡佬亦髻贯长簪,以铜铃、青白珠等为项饰,与“石棺葬”中所见者同。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·卷六》记石阡府“仡佬……男子绾髻于额,短裙编发;妇人袭青衣,用珠二三串悬于颈上以为饰。”嘉靖《贵州通志·卷三》龙里卫“平伐司,花仡佬……男子穿短裙,妇人穿花桶裙。……妇人盘髻贯以长簪,……杂缀海贝、铜铃、青白珠为饰。……男子椎髻,上插白鸡毛”。

前文已提到花溪、西秀、织金等地的相当部分“石棺葬”被当地人称作“仡佬坟”,表明其与仡佬可能的联系。针对仡佬族所进行的民族调查亦表明,大方、六枝、织金等地的部分仡佬族曾行“石棺葬”,或今虽已用木棺,但仍以石板砌筑坑壁。有些仡佬族自认当地用石板砌筑的“仡佬坟”为其祖先坟茔,普定的“打牙仡佬”每年清明还要到这些“仡佬坟”上去祭奠。

综上,仡佬部分支系在历史上确应曾行“石棺葬”。

另据调查,安顺、平坝等地的回族亦有行“石棺葬”的。回民进入贵州的时间最早可上溯至元初,后由威宁渐次向周边扩散。其主要的墓葬形制为洞室墓,“石棺葬”仅是特例,可能是其迁入黔中后受当地行此类葬俗的族群影响的结

果。

### 三、源流辨析

文献记载和相关发现均表明,入清以来,贵州多数族群渐“改用棺殓”,“石棺葬”渐趋式微,取而代之的是与汉族相同的木棺土葬。1980年代惠水、大方、安顺等地少量苗族和回族仍沿袭的此类葬习,已是“石棺葬”的子遗。可见,贵州“石棺葬”葬习的流向已经清晰。这里主要讨论贵州“石棺葬”的起源,并尝试分析其出现的原因。

石棺葬在我国东北、甘青和西南地区均有分布。童恩正先生早年曾根据包括石棺葬在内的诸文化因素的相似性,提出过“中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”的著名论断,认为生态环境的相似性和不同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,是产生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<sup>[13]</sup>。换言之,在相同的物质环境和共同需求下,民族的直接迁徙、融合和交往,观念的间接传播,可能滋生趋同的文化,同时亦不能排除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。这无疑是很见地的认识,讨论贵州地区的“石棺葬”亦宜从这两个方面展开。

#### (一) 生态环境

从黔中到黔西南,两个“石棺葬”分布区的共同特点是,喀斯特地貌发达,多山多石,用于砌筑墓葬的石材十分丰富且易于获取。正因此故,当地百姓至今仍有以石板砌筑房屋的传统。一种以天然薄石板作“瓦”苫顶的“石板房”成为贵州山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广泛分布在以安顺为中心的毗邻地区,包括贵阳、平坝、清镇、镇宁、关岭、六枝、龙里、惠水、紫云等地<sup>[14]</sup>,黔西南境内亦有一定分布,其使用者以布依族和屯堡人为主。有趣的是,“石板房”的分布范围恰与“石棺葬”的分布范围重合,这应不是什么巧合,相同的物质环境是滋生同一类文化遗存的前提。目前尚不知贵州以石板建房的传统源自何时,它们可能和以石板营建墓穴一样源远流长。而且,根据古人死如生事的习惯,为死者所建的幽宅,往往模仿其生前的住宅,这在黔北地区的宋代大型石室墓中显露至明<sup>[15]</sup>,作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居所的“石棺葬”,极可能是其生前所居的石板房在地下的再现。一为生者所居,一

为死者所寄,二者应是同一文化事像的两种表象,因此可以相互参照。

丰富的石材被用于营建各类建筑,于是造就一门世代相传的手艺,民国《贵州通志·土民志》就记在了清镇沙子坡的龙家“男子束发而不冠,善石工”。而石工的出现,为“石棺葬”的营建提供了技术支持。绝大多数“石棺葬”与石板房所用石材相同,均是在附近山上人工开采的片状页岩,薄而宽大。只有黔西南区部分“石棺葬”是使用附近山坡或河边捡取的无任何人工痕迹的天然石板营建的。

贵州石板房的分布,东未逾贵定,在贵定以东地区,迄今亦未曾发现“石棺葬”遗存。1992年,考古工作者在凯里鱼洞清理了4座遭破坏的土坑墓,收集铜条脱、簧形饰、铃、发簪等随葬品,另有青、白色串珠百余粒,“弘治通宝”3枚,知其应系明墓<sup>[16]</sup>。虽然墓内出土遗物与“石棺葬”所见者完全相同,但该处墓葬却系土坑墓而未“以石作棺”。这应是不同的生态环境使然。

严格而言,贵州“石棺葬”分布区与非“石棺葬”分布区的生态环境差异并不太大,制约一地是否行“石棺葬”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,该地石材的开采是否便利。文化与环境相互影响,贵州地区的“石棺葬”与石板房一样,是喀斯特的文化烙印,既反映了环境对人影响,又反映了人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。因此,客观上这是这类遗存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。

#### (二) 文化影响

##### 1、贵州石墓的流变

贵州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用石材营建的墓葬是赫章可乐M264。这是一座土坑积石墓,在墓坑底部用天然石块垒砌一周2?4层,高约0.3米,略似石椁,其内放木棺,棺内用青铜釜套头而葬一人,髻贯铜钗,腕佩铜镯,腰悬铁削刀。墓葬年代约在战国晚期<sup>[17]</sup>。但这种墓葬形制并未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贵州流行开来。

东汉中期前后,贵州出现以石块券顶的长方形、刀形、铲形或多室的石室墓,至魏晋时期尤为流行,但趋于简化。这类墓葬墓室一般长3~6、宽1~2、高1~2米<sup>[18]</sup>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室墓中,金、银、铜质的簪、钗、镯、条脱、指环,玛瑙、琥珀质的串饰等装饰品格外流

行<sup>[19]</sup>，这是其明显不同与东汉时期墓葬之处，反映了土著文化的回流<sup>[20]</sup>。而黔中区“石棺葬”的装饰品与之颇多共同之处。在墓葬形制上，清镇干河坝Ⅱ型“石棺葬”墓室狭长，部分长逾5、宽约1米的墓葬在形制上与魏晋墓葬十分接近，唯一的区别在于墓顶的结构，一为券顶，一为平顶。另清镇干河坝的M165保持了魏晋墓葬中的刀形结构。

平坝马场清理的2座唐代长方形石室墓，墓室长约5、宽约1、残高近2米，墓顶被毁结构不清<sup>[21]</sup>，从墓室的残存高度判断，可能为券顶。墓葬的规模和平面形制与前述魏晋墓和清镇干河坝“石棺葬”中的大者相同。

从部分“石棺葬”与魏晋石室墓在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上的相似性，似可认为黔中区“石棺葬”受到了该地区东汉中期以来流行的券顶石室墓一定程度影响，只是墓葬形制渐趋简化，墓顶由原来的券顶演变为平顶，墓葬规模小型化。其结果是出现了仅在黔中区流行的B型“石棺葬”。平坝肖家发现的C型“石棺葬”，墓顶叠涩而成，可能恰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券顶石室墓向北宋时期的平顶“石棺葬”过渡的中间类型。

## 2、族群移动产生的文化渗透

若前文的论述大致不误，视叠砌（平直或叠涩）起壁为黔中区石墓的传统，那么“平顶”可能就是外来外来的因素。即黔中区唐代尚是券顶的墓葬至北宋时几乎尽成平顶，并出现了A型“石棺葬”，可能是外力介入的结果。

前文的论述表明，在贵州“石棺葬”的两个分布区内，黔西南区的时代早可至汉晋，目前仅见A型“石棺葬”，可能与仲家及其先民有关；黔中区时代主要在宋明时期，兼有A、B、C三型“石棺葬”，可能与龙家、仲家、苗和仡佬有关。据此，似可认为黔中区“石棺葬”中的某些文化因素（如墓顶为平顶，A型“石棺葬”等），是受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影响的结果。墓壁叠砌则是当地的传统

文献中有关“仲家”和“龙家”关系的记载，隐隐透露出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的使用人群北向渗透影响及黔中区的可能。“马蹬龙家”是文献中确切记载使用“石棺葬”的族群，而“龙家与仲家同俗”，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黔西南区

“石棺葬”可能与仲家或其先民有关，因此可以认为“马蹬龙家”行“石棺葬”是受同俗的仲家影响的结果，甚至不能排除龙家为仲家某一支系的可能性。明弘治时“州民皆为龙家”的安顺州，现在居民中的相当部分为布依族。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·卷九》记永宁州（今关岭）有仲家、罗鬼、仡佬、苗、龙家诸夷，并引旧志称：“本州夷民皆广西泗州分拨而来”，明确表明弘治以前有民族集团北向移动的事实存在。而结合前文的分析看，北宋时，仲家便可能已一次或几次大规模北向移动渗透入黔中地带，使此前流行券顶石室墓的黔中区受到了“石棺葬”文化因素的影响，传统与外来因素的结合，便形成了黔中区A、B、C诸型“石棺葬”并行的格局。

那么，黔西南区汉晋时代的“石棺葬”又从何而来？

## 3、与川滇地区石棺葬间可能的文化联系

童恩正先生在讨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的石棺葬时认为，“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，西南次之，东北又次之。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，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。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，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氏羌系统的民族（其中以氏族的可能性较大）所采用的一种葬具，以后才传播到‘西南夷’和东北的‘胡’、‘戎’诸民族中去的。”

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主要分布在川西、滇西北地区，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<sup>[22]</sup>。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在时代上恰能与之相接。但在地域上，彼此间尚存在较大的空白地带。近年在南盘江流域的云南罗平八大河也发现“石棺葬”遗存，但未见随葬品，时代不详<sup>[23]</sup>。越南北部的鼎乡遗址中亦曾发现“石棺葬”遗存，墓葬以石盖顶，或以石立边，部分用陶瓮作为葬具，年代为青铜时代<sup>[24]</sup>。从地缘和时代看，黔西南区的“石棺葬”可能与相邻的越南和云南境内的同类遗存有关。而这一区域的“石棺葬”遗存是川滇地区青铜时代石棺葬南向影响的结果，抑或独立产生，尚难定论。从云贵高原青铜时代文化与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间的关系，及其与北方草原文化间的某些文化联系看，黔西南及其周边地区“石棺葬”受川滇青铜时代石棺葬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

## 四、结语

通过前文的论述,可形成以下几点认识。

1、在贵州“石棺葬”的两个分布区内,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形制相对简单,部分地点与瓮棺葬共存,与越南鼎乡遗址的情况存有相似之处,该区“石棺葬”可能与“仲家”、“龙家”或其先民有关。黔中区“石棺葬”形制相对多样,A、B、C诸型墓葬共存,人物装饰十分繁缛。其时代主要在宋明时期,可能与“马镫龙家”、“仲家”、“苗”和“仡佬”的部分支系有关。黔中区部分苗族、回族迄今仍在延用这一古老葬习。

2、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是生态环境、文化交流等多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。喀斯特地貌是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,“石棺葬”与石板房分布区大致重合的情况值得关注,二者一为生者所居,一为死者所寄,可以相互参看。“石棺葬”这一文化事像的出现,同时应也受到了更早使用此类葬俗的族群直接或间接(如观念的传播)的影响。种种迹象表明,可能存在一个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因素由南而北传播,与黔中区传统因素相结合而产生了黔中区“石棺葬”的历史过程。这种情况的出现,可能和“龙家”、“仲家”民族集团的北向移动有关,这一时间应不晚于北宋。

3、而黔西南区“石棺葬”的源头何在,其与川西、滇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石棺葬间是否存有文化联系,目前尚不能定论,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,还有待更多的资料。

由于多数材料系调查所得,发掘材料不多,或虽经发掘但因各种原因材料尚未刊布,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的整体认识,因此本文的一些观点还有待今后的发现予以补充和检验。

注释:

[1] 席克定:《灵魂安息的地方——贵州民族墓葬文化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。

[2] 贵州省博物馆:《贵州清镇宋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》1960年第6期;贵州省博物馆:《贵州平坝马场唐宋墓》,《考古》1981年第2期。

[3] 何凤桐、李衍垣:《贵州清镇干河坝石棺葬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2年第3期。

[4] 李衍垣:《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。

[5] 李飞:《试论贵州地区“石棺葬”的分区与年代》(《考古与文物》待刊)。

[6] 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贵州府县志辑》,巴蜀书社2006年。

[7]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贵州省志·民族志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10月。

[8] 明嘉靖·田汝成:《炎徼纪闻·卷四》,《中国西南文献丛书(80)》,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。

[9]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编:《贵州“六山六水”民族调查资料选编·布依族卷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2月。

[10] 姬安龙:《贵州苗族支系调查报告》,《贵州“六山六水”民族调查资料选编·苗族卷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2月。

[11] 海贝在时代大致相当的岩洞葬中却有大量发现。参见李飞:《贵州崖葬略论》,《贵州民族研究》2009年第1期。

[12]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编:《贵州“六山六水”民族调查资料选编·仡佬族、屯堡人卷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2月。

[13] 童恩正:《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》,《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。

[14] 《石板房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1月;熊康宁等著:《喀斯特文化与生态建筑艺术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。

[15] 参见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。

[16] 席克定:《凯里市明代残墓清理纪要》,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。

[17]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:《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2008年6月。

[18] 宋世坤:《贵州两汉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的演变》,《贵州考古论文集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。

[19]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:《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73年第6期。

[20] 李飞:《夷汉之间——从考古材料看贵州汉晋时期的文化格局》,《贵州民族研究》(待刊)。

[21] 贵州省博物馆:《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》,《考古》1981年2期;李衍垣:《贵州中部的石棺葬》,《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》89页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。

[22]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:《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现(1938~2008)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。

[23] 李保伦:《云南滇东北地区川滇间的文化交流线》,《三星堆研究》第二辑“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”,巴蜀书社2008年10月。共清理3座,属本文所划分的A型石棺葬,未见任何随葬品。

[24] 卢智基:《越南北部发现的石棺葬》,2009年7月西昌藏彝羌走廊与中国西部石棺葬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。